

中国东南抗战文化史论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RENMINCHUBANSHE
王嘉良 叶志良 毛策

目 录

绪 论	中国抗战文化总体背景下的重要地域文化	(1)
第一章	“东南半壁”抗战文化群体形成的历史原因	(18)
一	历史的遇合：唇齿相连、血脉相通的东南历史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	(21)
二	现实基因：全国抗战总态势下“东南一隅”的独特地位与独特的文化聚合	(28)
三	时代机遇：东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对稳固的历史保证	(39)
第二章	东南抗战文化运动发展述略	(50)
一	战争的进程与文化活动的基木流向	(50)
	第一阶段：从全国抗战开始到武汉失陷	(51)
	第二阶段：从武汉失陷到浙赣战役发生	(58)
	第三阶段：从浙赣战役到抗战胜利	(65)
二	三足鼎立、犄角相依的三个文化中心	(71)
	1. 浙西南：金华——丽水文化中心	(72)
	2. 闽西北：永安——南平文化中心	(79)
	3. 赣东南：上饶——赣州文化中心	(85)

第三章 东南抗战文化构成之一：文学艺术领域	(92)
一 文学创作：大忧患时代高昂民族情绪的呐喊	(97)
1. 大时代的宠儿——报告通讯	(98)
2. 表现抗战到底的小说	(102)
3. 呼喊民族心声的诗歌	(106)
4. 歌颂与暴露并重的散文	(108)
二 戏剧创作：战争催生下群体精神的独特呈现	(112)
1. 深入民众的救亡剧运的兴起	(112)
2. 剧本创作：现实面前的自觉聚焦	(117)
三 艺术创作：在抗战声浪中弹拨的主题变奏	(120)
1. “刀与笔”：以刀笔作投枪的木刻、美术创作	(120)
2. 弦外之音：抒唱时代心律的音乐创作	(125)
第四章 东南抗战文化构成之二：社会科学领域	(133)
一 军事学研究：从国内战场到二战的全面述评	(136)
1. 军队的生命线：军队政治工作研究	(137)
2. 国内战局和抗战形势的述评	(139)
3. 分析开辟敌后战场的必要性与策略	(142)
4. 对二战局势的科学测评和国际时事研究	(144)
二 政治学研究：以统一战线与民主政治为中心议题	(147)
1. 促进统一战线稳固的理论阐述	(147)
2. 切中时弊的时政评论	(150)
3. 对中国特定政治形态——官僚政治体制的剖析	(153)
三 经济学研究：抗战建国的经济体系构想	(156)
1. “中国化”经济法则的理论建设	(157)

2. 探讨地方经济与大社会背景的关系	(161)
3. 土地问题:农村经济问题的调查	(164)
四 教育学研究:战时教育与教育体制之构想与展望	(166)
1. 战时教育在矛盾中的选择	(166)
2. 战时教育体制重建之总体构想	(168)
第五章 东南抗战文化构成之三:新闻出版领域	(173)
一 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战时的艰难与新闻业的中兴	(173)
1. 战时新闻传媒的网络结构及其型态特征	(176)
2. 战争新闻的时效性与鼓动性	(182)
3. 新闻在民主化进程中的正反效应	(185)
二 在艰难竭蹶中走向繁盛的出版业	(191)
1. 战时东南出版机构鸟瞰	(196)
2. 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主体的重要出版物	(199)
第六章 东南抗战文化的生力军——大众文化	(208)
一 深入山野、遍及各地的民众文化	(210)
1. “文化下乡”开辟普及民众文化的新生面	(210)
2. 民众文化的重要形式:演剧及歌咏活动	(213)
3. 文艺大众化促进通俗文艺的发展	(215)
二 激励士气、鼓舞斗志的军队文化	(217)
1. “政训队”的建立与以军队政治工作为核心的军队文化活动	(217)
2. 战地服务团推动下的军队文化建设	(219)
三 发扬五四文化传统的校园文化	(222)

1. 救亡声浪压倒一切：校园文化的特质	(222)
2. 战时校园流徙：校园文化与民众文化的融合	(226)
第七章 东南抗战文化基本特征的归纳	(230)
一 文化建构：地域文化与整体文化的统一	(230)
二 文化效应：实现“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使命	(234)
三 文化特质：民族精神的文化呈现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底蕴	(237)
后 记	(244)

绪 论

中国抗战文化总体背景下 的重要地域文化

半个多世纪前，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这一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而告终，显现了中华民族的浩气与尊严，显现了我们民族空前的凝聚力，也显现了我们这个有 5000 年文化传统的民族不可战胜的意志与力量。

历史的经验是永存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因素的全面较量，因此中国抗战史所昭示于我们的，应是诸因素提供的经验的总和，其中作为战争史上的奇观呈示的，是一个经济和军事实力上相对较弱的国家打败一个经济、军事强国的经验。这个经验证明：决定战争胜负的，往往并不主要取决于经济、军事实力，而取决于制订正确的政治路线与政治策略，取决于动员“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①的民众的力量，取决于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民族精神的大觉醒、大奋起、大昂扬。因此，抗战史所昭示的重要经验，是它的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中国 8 年的抗战史证明，正是由于全国的军事总动员与全国的精神文化总动员相偕进行，而且又是后一种动员得以较为全面的实施与强化，才使抗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

利。在这个总动员中，全国人民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有识见的“文化人”和普通民众，“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团结一致，融汇在抗战洪流中，利用各种文化武器宣传抗日，造成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又一次波及全国、规模空前的伟大的文化运动，使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民族文化精神得到充分弘扬。可以说，一部抗战史，既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同时也是集中宏扬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总结抗战文化的历史经验，对于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将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本书描述的中国东南地区抗战文化，拟从抗战时期相对集中的—一个特定地域入手，考察东南抗战文化的形态特征及其诸种文化构成，总结其历史经验，以此映照、透视我国的整体抗战文化，为总结我国抗战文化的完备的历史经验提供必要的佐证。由于战时东南文化仅是我国抗战文化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其形态特征及发展趋向必受制于整体文化，因此在展开全书描述以前，有必要对中国抗战文化的总体特征及地域性特点等作一番概略的述评。

—

审察我国抗战文化的总体特征，首先必须论及抗战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这里文化之于抗战有着特殊重要性之所在，也是文化活动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得以在全国范围广泛、深入、持久开展的必要前提。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本质意义上说，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是中国人民面对一个自有文明史以来的最凶恶的敌人以亡我中华为目的实施横暴侵略而奋起抗争、谋求民族生存的

正义之战。这场战争的反侵略性质，从一开始便显现出它的文化意义。诚如我国卓越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在战争初期就指出的：“目前的世界很明显地划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克制着兽性，发挥着理智，把人类推动向进化一面走；一边是发挥着兽性，克制着理智，把人类推动向退化一面走。……在目前我们中日两国的战争，不正是这两个阵营的短兵相接吗？这抗战可以说是理性与兽性之战，是进化与退化之战，是文化与非文化之战。”^②这里，郭沫若指出的战争的文化性质，是以广义上的文化精神——人类文明的进化与退化的角度立论的，具有无可争辩的正确性；即便仅就具体的文化内涵而言，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破坏与摧残，交替施行军事战、政治战与文化战，也反映出中日这场战争在文化上的侵略与反侵略、征服与反征服的性质。这至少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其一，日寇侵华，与疯狂的经济掠夺与资源掠夺相随进行的，是野蛮的种族灭绝与文化灭绝。战争发动甫始，日本军国主义者便发出“三月亡华”的狂妄谰言。从这里，自诩为“优等民族”的一小撮战争贩子妄图在短时期内灭亡另一个有着更为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在这种“民族征服”的强盗逻辑支配下，人类的文明精神已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是灭绝人性的掠夺与毁灭。日寇在中国领土上制造的桩桩惨绝人寰的暴行，诸如在南京的大屠杀，在东北的活人细菌试验，对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对大后方的狂轰滥炸，对沦陷区的血腥蹂躏等等，体现了妄图实行种族灭绝的惨酷性；其中表现为文化灭绝的，则是敌寇对我国文化机构、文化设施、文化财富的疯狂摧残与掠夺，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文化浩劫。仅据战争初期的不完全统计，在战争开始不到3年的时间内，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战区各省市教育机关财产损失数目，已达

1.8 亿万元，此项损失还不包括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上海的同济、暨南等大学全部炸毁，所受的损失实在难以数计。特别是图书的损失，仅据 3 年统计，被敌人劫走的图书，北平约 20 万册，上海约 40 万册，天津、济南、杭州等处约 10 万余册；战前全国图书馆有统计可查者共计 4000 余所，被敌寇毁灭的竟达 2/3。至于稀世珍宝、历史文物、私藏家书被毁弃、被掠者，其价值更难以统计^③。如果说，战争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破坏，在战后尚有恢复之可能；那么，文化作为数千年精神文明的积累被毁于一旦，尤其是诸多珍贵书籍、稀世文物遭受毁损将永远无可弥补，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无可挽回的损失——即此一点而言，日本侵略者发动的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的反文化意义是显得尤为突出的。

其二，日寇妄图征服中国。他们在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又实施“文化征服”，使战争显示出明显的文化侵略性。既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以亡我中华为目的的侵华战争，灭亡，就意味着既是军事上的，更是文化上的。日本侵略者深知：要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臣服，单有“军事征服”是不行的，“军事征服”可以占领土、夺矿山、抢资财，却断不能“征服人心”，实现其持久独霸中国的迷梦。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侵略的同时辅之以文化侵略，对中国人民实施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渗透和文化奴役，并把这定为领先的和长期的战略任务，这便是敌寇对华的“重要国策”。早在战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已对中国实行各种形式的“文化战”：它在上海设立“同文书院”，培养一批又一批文化特务，在中国境内进行文化间谍活动；在北平设有“文化研究所”，打着研究文化的幌子侵吞、偷盗、掠夺我国各种宝贵的研究资料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它的外务省里，也设有所谓“对支文化局”（在战争期间更扩大为所谓

“兴亚院”、“文化部”)。他们一方面对异民族进行海盗式的文化掠夺,另一方面却又不忘积极进行其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奴役。一时间,所谓“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大东亚”文化理论宣传甚嚣尘上,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新民会”之类的奴化政策宣传机关纷纷出笼,各种培养奴化教育人才的训练班大肆开张,为侵略者张目的报章杂志、教科书也大量出版。如此等等,都构成“文化战”的重要内容。敌人进行文化奴役的效果,倒也“立竿见影”,当时一大批民族败类就拜倒在“大东亚”文化理论面前,汪精卫叛国时即鼓吹“建立东亚新秩序”;伪满汉奸也宣称“满洲建国以王道乐土为立国之根本”^④。由此看来,敌人在文化侵略方面所下的功夫并不逊于军事侵略,而文化侵略的后果及其潜在危险甚至有甚于军事侵略。由此,中国人民的抗战,只有在敌人开设的两个战场——军事战与文化战方面同时作战,才能彻底击败敌人,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

上述现象证明,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本质上说是文化与非文化之战,是有其历史与现实依据的。而战争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势必决定了作为正义力量一方的我国的抗战文化有着不竭的现实生命力和久远的历史价值。郭沫若指出:“没有比较不足以见优劣。有了敌寇的披着兽皮的‘文化’行列,愈见显示出了为真理为正义而战的纯正文化的光芒。”^⑤是的,正由于我国的抗战文化是一种闪耀着真理与正义光华的“纯正文化”,才能调动千千万万的文化大军,形成严整的阵营、雄浑的声势、深厚的力量,与敌人在文化领域展开一场殊死的较量;也唯其文化的真理与正义性,才使我们有可能粉碎敌人的文化侵略攻势,并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战中显示出富有悠久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力,为中国文化史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史写下极精彩的一章。

由抗战本身的文化意义所规定，抗日文化运动之深入、持久的开展是构成我国整个抗战活动的重要内容，由此也使抗战文化形成了有别于我国现代史上任何一次文化运动的显著特点。从文化内涵上说，抗战文化以唤醒国民抗敌意识、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为主体，既显示出在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中谋求民族的生存与进取、保卫自身文化的纯洁与发展的“纯正文化”的特色，也反映出我国的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振与新建，它遇合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与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中，体现出与“世界上一切进步的学术与科学”相交流和“加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内容”^⑧的特点。从文化力量构成说，抗战文化真正实现了文人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实现了我国文化界自“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空前的团结与统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支“文化新军”，其规模与声势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从文化的空前普及对国民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乃至整个文化思想体系的重建来说，抗战文化促进了我国“新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乃是它在更深刻与更广泛的意义上所显示的新文化运动的特点，由此也显示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把抗战文化运动看成是我国文化思想领域里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又一次“新启蒙运动”，是早为理论家们注意并加以阐述的。著名理论家、在抗战时期曾担任中共东南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的邵荃麟，在其总结抗战初期文化运动特点的文章中就指出：随着抗战文化的普遍展开，“中华民族的第二代文化正在统一持久的神圣抗战中成长”，而作为其第一个重要特点显

露的，“是新启蒙运动有空前的发展”^⑦。抗战中期，他进一步阐发了“新启蒙运动”理论，认为建设抗战文化提出民族化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为适应现阶段中国历史的实际要求，这一切仍应认为是承袭着‘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它的总方向仍然是‘五四’所提出的启蒙运动”^⑧。当时的文化工作者还有专文阐述“新启蒙运动”的，如石础的《抗战中的新启蒙运动——为纪念五四运动作》^⑨，对中国的启蒙运动作了历史回顾，着重论述了抗战文化的新启蒙运动特点，要求文化界能在“抗战的过程中，接受过去启蒙运动的成果，加以新的估价批评从而建立新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些理论主张，今天读来仍不失其新鲜感，是因为它们精辟地概括了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显示了抗战文化本身所固有的价值。

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启蒙运动，就其实质来说，是人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唤醒民众，打破陈腐的愚蒙的传统思想的束缚，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造就一种完全新颖的思想文化体系，去面对新的世界文化潮流。正是在这一点上，抗战文化运动是旧的思想启蒙运动所不可比拟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家所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固然也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面临亡国灭种危机时的一种文化意识的觉醒，表现出对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怀疑精神和弃旧图新，但终究由于那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念并没有彻底改变抱残守缺的实质，因此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都只能是文化的局部改良，并不可能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化意识上表现出对封建文化的彻底决裂与反叛，且引进德、赛二先生，提倡科学与民主，确立起一种全新的文化观念，取得了与世界文化对话的条件，的确堪称为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抗战文化运动“承袭”着“五

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特别是由于“五四”文化深刻的影响力所致，因此也就决定了这两种文化在总体精神上的一致性，都可纳入毛泽东所总结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范畴。将这种文化精神发扬光大，并使之真正具有丰富而厚重的文化积累，势将在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造就“中华民族的第二代文化”。

然而，抗战文化运动比之于以往的新文化运动毕竟又有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文化普及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由于面临抗敌救国的严峻形势，急需提高全体民族的文化素质，特别是提高原来文化水准低下的劳动大众的文化素质，以弘扬民族精神，树立起抗战的必胜信心。于是，文化人走出大城市，走向山野、乡村，走向部队、前线，用各种通俗文化形式向民众普及文化，这在整个抗战期间是蔚为风气的。郭沫若在总结三年文化战的经验时，特别对文艺工作者、新闻记者、社会科学家走到抗战第一线，“走向军队，走入乡村”、“浩浩荡荡的使文化力量弥漫到了全国”，表现出惊喜，称这是“中国文化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文化战线更显出了刚健雄伟的姿态”^⑩。当然，在抗战期间固然也有一二迂腐学者主张“踱进研究室”做死学问为好，认为宣传民众的小型杂志徒浪费了油墨纸张，妨碍了学术研究，“顿使中国文化发生了一个黑暗时代”^⑪。“战国策派”的教授先生们甚至公然鼓吹“战为中心”，取消“民治”，取消动员民众的文化取消主义^⑫。然而，这不过是偶而泛起的一两个泡沫，随即为强大的民族救亡声浪所淹没；而且，随着对这种不合时宜的复调变奏的批判，文化界的认识更趋于一致，文化普及运动得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这种文化现象，至少在抗战以前是不曾遇见的。其次，抗战文化运动致力于新的文化思想体系的构建，也使新启蒙运动在内容上有所深化。基于

反侵略斗争的现实要求与新启蒙运动提出重建国民文化精神的历史使命，抗战文化实际上有着两个层面。其表层面表现为文化的宣传作用与动员作用，使之在激励民众的民族意识、投入神圣的反侵略战争中产生现实效应；其深层面则是国民文化精神的根本改造，从本质上提高我们的民族文化素质，使之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文化之林。这两者同样有重要意义，而且往往是互为表里不能分割，绝不可是此非彼。放弃民族生死存亡这个最现实的文化问题，躲进研究室里侈谈什么文化建设，文化不免落空；同样，倘只是将文化运动流于一般的民众宣传，而不能利用救亡这个契机开展深层次的文化启蒙运动，文化建设也将丧失良机。当时的文化工作者实际上是把握了这个有利时机的，注意抗敌宣传与文化建设并重，针对抗战提出的诸多文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研究范围涉及政治学、军事学、哲学、经济学、文艺学、教育学等各个方面，掀起了一个文化研究热潮，从而把抗战文化运动推向深入。当时在全国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文化区域如延安、重庆、桂林等，文化研究极一时之盛，即便与上述区域相隔较远的东南地区，当时广泛讨论各种文化问题也蔚为风气，如《东南战线》、《浙江潮》、《改进》、《现代青年》等，都把文化建设标举为办刊的重要宗旨。《浙江潮》提出，要同敌人“企图毁灭我们的文化”针锋相对，“创造更广大的新的文化基础”，“让我们在这时接受旧的遗产创造出新的科学、哲学、艺术——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来适合新中国的需要”^③；《改进》则认为应“将抗战工作与建国工作同时推进”，“文化人最重要的工作是宣传民众，教育民众”，但“同时决不忽略各种专门学问的研究”，以期使中国在思想学术方面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文化潮流^④。抗战文化运动向着深层次突进，不但使某些学者担心会出现文化的“黑暗时代”成为一种杞忧，

而且还使文化研究得以在更大规模上展开和更具现实意义的态势上行进，朝着建构新的文化思想体系的方向发展，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我国的新启蒙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

抗战文化的“新启蒙运动”在广度与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显示了文化的多层次展开及其结出的丰硕成果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巨大意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文化运动是在极艰难的情势下展开的。战争破坏了一切正常秩序，河山破碎、国土分裂、交通阻隔，像以往和平时期那样实现文化力量的自由交往与聚合已不可能，即便欲觅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环境亦属奢望。战争环境的险恶性，遂形成我国抗战文化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文化运动的区域性。

随着战争进程的推移，抗战文化的区域性特点表现得愈益明显。自“七七”全面抗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前，大半国土尚未沦入敌手，主要的文化力量尚可聚集在一些大都市内，于是就有在武汉成立全国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之可能。武汉失守后，敌寇步步进逼，沿海的大都会几乎均被敌攻陷，加以南北交通干线被敌贯通，侵略势力深入我国腹地，于是我国原有文化群体的全面散落和大批文化人的辗转流徙，已成为不可阻遏的趋势。1941年12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了香港和“孤岛”上海，使这两地的抗战文化活动严重受阻，于是又促使一大批文化人转移。正是在这种战争的环境下，原来以沿海大都市为文化中心而左右全国文化活动的局面不能不有所改变，文化工作者也唯有在散处各地后实行新的文化组合，方

能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情势。正如邵荃麟所指出的：“今天的抗战是持久战全面战，在这个战争中间，中国将出现若干独立的抗日战区，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建立它的文化中心，然后才能使文化配合着政治而进行，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新启蒙运动获得胜利的发展。”^⑮姚雪垠在谈到文艺工作者必须适应抗战新形势时也指出：“战争改变了一般的国民生活，也改变了作为文化战士的作家的生活。……战争一方面破坏了上海和北平两个文化中心，一方面也打破了作家们活动的狭隘天地，把他们送到前线、后方、新生的地带和落后的穷乡僻壤。”^⑯由此看来，抗战文化运动的区域性特点的形成，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但区域性也不是单纯的条块分割，区域性又具有相对集中性，往往表现为在现实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文化组合。概括言之，区域性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原有文化中心衰落，多个文化中心形成。诚如人们已经指出的，抗战以前，我国两个最大的文化中心在北平与上海。北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上海是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抗战以后，这两个文化中心相继衰落。北平首当其冲，随着日寇大举侵华，大批文化人奔走内地，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也陆续迁往昆明，这个文化中心已不复存在；只有以周作人为盟主的附逆文化在散发着腥臭。随后是上海沦陷，进步文化人士大抵出走香港、桂林、昆明、重庆等地，只有一部分转入“孤岛”租界里，继续从事抗日文化活动，但由此上海也不再成为影响全国的文化中心。中心的衰落，必然形成区自为战的格局，而文化人相对聚集在文化出版条件较好的城市（或县城），于是才有多个文化中心的形成。武汉失守以后，我国的抗战文化运动大体上形成了三大板块、多个中心。第一大板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文化，它以延安为文化中心，同

时又有其他较小的文化中心，如八路军活动区域的晋察冀文化、新四军活动区域的苏中、苏南文化等。第二大板块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文化，它以重庆为文化中心，又有桂林、昆明、新疆等地的较小的文化中心，东南地区的文化也包括在这一板块之内，其中有金华、永安、赣州等地的文化中心。第三大板块是沦陷区抗战文化，它以上海的“孤岛”文化为代表，也包括东北、台湾及其他沦陷区人民开展的地下抗日文化活动。各个文化区域和文化中心并不截然分割、各自封闭，由于同一的抗战目标，使它们有着较紧密的联系，还由于文化工作者的流动，使区域间的沟壑相对缩小。因此，各区域文化虽都各有其侧重点和表现形态，但总体方向是一致的，均为抗战文化作出了贡献。

第二，文化力量向僻远地区扩散，构成了我国新的文化布局。抗战前，我国的文化力量除集中在几个文化中心以外，其余的大多分布在沿海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里，文化出版物也多聚集于此。内地的小县城或一些偏僻省城，也很少见到真正的文化粮食，尤其是难得见到新文化读物。抗战以后，随着大批文化工作者挺进“新生的地带和落后的穷乡僻壤”，这一局面有了根本改观。首先是文化人随着战局的变动而分散到各省各县，宣传队、战地服务团之类的组织遍布各地，同时各战区一般都还有自己的宣传文化机构，这使得新的文化中心的建立成为可能，也使大抵处于敌后的战区范围内的文化得到一时的兴盛，而这些地区过去往往是文化贫瘠地带。以东南地区为例，金华、丽水、永安、南平、屯溪、赣州、吉安等地，除金华以外，其余均为名不见经传的小县份，以往文化落后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抗战兴起，这里立时成为文化繁荣区域，各地都组织了文化团体，发行各种报刊和文艺宣传品，成立歌咏